

· 人文新探 ·

中医隐喻：肺、胆因何成“将军”

倪 奇, 贾春华, 赖 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素问·灵兰秘典论》有“肝者, 将军之官”一语, “肝为将军”已成为中医学中较为主流的观点。但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 肝并不是唯一称“将军”的脏腑, 《张仲景五脏论》《备急千金要方》《华氏中藏经》等医籍中, 肺与胆也都被喻为“将军”。因此, 结合医籍成书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 从隐喻的角度分析肺、胆为将军的原因及其与藏象理论的关联, “将军”作为始源域所映射的脏腑由肝扩展到肺和胆, 以及“肺、胆为将军”的官职隐喻未被后世沿用, 与不同历史时期“将军”职能、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 不同时期“将军”的职能、地位与藏象理论中肺和胆的功能、位置是“肺、胆为将军”官职隐喻形成的重要基础。由此可见“隐喻”在中医藏象理论构建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 将军之官; 肺; 胆; 隐喻

DOI: 10.16307/j.1673-6281.2024.04.006

中图分类号: R223.1; R-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4)04-0341-007

Metaph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y Lung and Gallbladder are called “General”

NI Qi, JIA Chunhua, LAI Min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Liver being called “general” has been a mainstream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owever,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CM, liver was not the only organ endowed with the official position title of “general”. Lung and gallbladder were also given the title of “general” in medical books such as *Zhang Zhong Jing Wu Zang Lun* (《张仲景五脏论》 *Treatise on Five Zang Organs by Zhang Zhongjing*), *Bei Ji Qian Jin Yao Fang* (《备急千金要方》 *Important Formulas Worth a Thousand Gold Pieces for Emergency*) and *Hua Shi Zhong Zang Jing* (《华氏中藏经》 *Central Treasury Classic by Hua Tuo*).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reason why the theory of lung and gallbladder called “general” appeared in ancient tim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theory and Visceral Manifestation of 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o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 when the three medical books mentioned above were writte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henomena about organs mapped by “general” as the original domain were expanded from liver to lung and gallbladder, and the final decline of the theory of lung and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1874514)

[第一作者] 倪奇 (ORCID: 0000-0002-1444-883X), 博士生; E-mail: 120875410@qq.com

[通信作者] 贾春华 (ORCID: 0000-0003-0832-0220),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mail: jiachunhua125@163.com

gallbladder being called “general”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f the functions and status of “general”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function and status of “general”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function and anatomical location of lung and gallbladder in Visceral Manifestation of TCM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of lung and gallbladder called “general”.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metaphor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isceral Manifestation of TCM.

【Keywords】General; Lung; Gallbladder; Metaphor

隐喻这一概念自古希腊时期诞生，最初被视为文学中的修辞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隐喻的本质是以一件事和经验来理解另一件事和经验。”^{[1]11-19}将人们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事物或概念作为始源域，将未知的、无形的、抽象的事物或概念作为目标域，隐喻即是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过程，人们借助前者认知后者^[2]。“取象比类”作为中医学的重要认知工具，与隐喻具备相通的认知结构要素以及认知媒介，被称为“中国式隐喻”^[3]。因此，隐喻是分析、解读中医学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

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受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形成了一系列以官职为始源域，以脏腑为目标域的隐喻映射，即“脏腑官职”隐喻。官职与脏腑的映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不同历史时期同一官职映射的脏腑有所不同。自从《黄帝内经》确定了“将军”与肝脏的隐喻映射，“肝为将军”就成为中医学理论中较为主流的观点，但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肝脏并不是唯一被赋予“将军”官职的脏腑。以“将军”为关键词在知网与《中华医典》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后发现，有 4 部中医古籍，即《张仲景五脏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华氏中藏经》，称肺、胆为“将军”。其中，《备急千金要方》与《外台秘要》均成书于唐代，且其所载脏腑与官职的对应关系基本一致，故本文仅以《备急千金要方》为例，《外台秘要》则不再赘述。此外，据传为华佗遗作的《华佗神医秘传》也称胆为“将军”，但该书有伪作之嫌^[4-5]，故本文也暂不涉及。综上所述，本文选取《张仲景五脏论》《备急千金要方》《华氏中藏经》为研究对象，力图从隐喻认知的角度，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官职制度，分析“将军”作为始源域映射除肝脏以外的脏腑的背景及原因，以此探讨社会政治环境对中医学理论构建的影响。

一、医籍的成书年代及“将军”的职能地位

本章结合 3 部著作成书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分析“将军”的职能与地位变化。《备急千金要方》成书于唐代，另外 2 部医籍的成书年代则存在争议，在此仅作简要讨论。

（一）《张仲景五脏论》

《张仲景五脏论》称肺为“将军”，这部医籍的疑似成书年代覆盖从南北朝后期至唐代的历史时期，仅有敦煌残卷存世，目前尚未出版。日本学者宫下三郎在对敦煌残卷《张仲景五脏论》进行校勘后，发现其内容与《医方类聚》中收录的一部名为《五脏论》的医籍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宫下三郎判断二者可能为同一著作，并参考《五脏论》对《张仲景五脏论》进行校勘^[6]。据此，本文所引《张仲景五脏论》的内容以宫下三郎的校勘成果和《医方类聚》中的《五脏论》作为共同参考^{[7]81-84}。敦煌残卷《张仲景五脏论》共有 4 个不同的版本，编号分别为 P.2115、P.2378、P.2755、S.5614，其中以 P.2115 时代最早，抄写于唐代初年，这说明《张仲景五脏论》应在唐初或之前就已成书^[8]。因此，我们认为《张仲景五脏论》成书的时间范围应为南北朝后期至唐初，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军事被推到首要位置，“将军”的地位日

益凸显^{[9]8}。南北朝与唐代之间仅经历隋代的短暂统一，战乱的阴影挥之不去，“将军”仍然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地位。

（二）《备急千金要方》

《备急千金要方》称肺、肝为“上将军”，胆为“将军”^{[10]203,279,479}。《备急千金要方》成书于盛唐，此时国家重归统一，社会繁荣安定，武职人员的征战职能有所弱化，逐渐向宿卫、治安等方面拓展。唐代推行府兵制，府兵职责有三：一为京城宿卫，这是最主要的一项职责，府兵除宿卫宫禁外，还担负维护京城治安之责；二为戍边或留本地服役；三为参与征伐^{[11]992}。由此可见，唐代武职人员的职能以宿卫为先，征战的职能不甚突出。“上将军”作为府兵统领，自然也以宿卫宫禁、保护君主安全为主；“将军”也为府兵将领，但较“上将军”次一级，从属于“上将军”。

（三）《华氏中藏经》

《华氏中藏经》称肺为“上将军”、胆为“将军”^{[12]35,52}。关于《华氏中藏经》的成书年代，赵晨、沈红指出其所反映的语言时代为北宋^[13]；林毅对其脏腑辨证部分进行考证，认为其成文时间应在北宋^[14]；李晓艳对《华氏中藏经》的流传版本进行研究，提出其现存的最早版本为赵孟頫写本^[15]。赵孟頫生活于宋末元初，说明该部医籍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这一时期。综上所述，《华氏中藏经》，尤其是本文所涉及的脏腑辨证部分，极有可能成书于宋代。因此，有必要从北宋的社会政治背景分析“将军”的地位与职能。宋代官制较为混乱，常常名实不符，“上将军”一职承袭自唐代，虽有名位，但在宋代已无实权，成为用于安置宗室和闲散武官的虚衔^{[9]20-25}。另外，宋代统治者重文轻武，《宋史》有言：“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16]12997}《文献通考》记载：“世之罽人者，曰黥卒，曰老兵，盖言其贱而可羞。”^{[17]1343-1349}可见宋代武人极受鄙夷，因此实际承担武官职能的“将军”多受轻视。

二、肺为“将军”的官职隐喻

《张仲景五脏论》称肺为“将军”，《备急千金要方》《华氏中藏经》均称肺为“上将军”。

（一）“将军”的职能与肺脏的功能

《张仲景五脏论》云“肺为将军”。根据原文中“毛发为肺”“肺主皮肤”“鼻为肺应”等记载，这部医籍在肺脏功能及脏腑体窍相应关系等方面的认识与《黄帝内经》中的藏象理论并无出入，而改称肺为“将军”，应受其时代背景影响。此书成书时战乱不断，“将军”的职能与战争紧密关联，或征伐他国，或抵御外侮。肺司呼吸，经由鼻窍与外界相通，外邪侵袭往往先入肺，且肺在体合皮，其华在毛，外邪袭表，亦可内传于肺。皮毛与肺是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恰如将军在前线征战，拒敌军于外，保疆土百姓于内。《备急千金要方·五脏六腑变化旁通诀》“五脏官”一节称肺为“大尚书”，又为“上将军”。唐代“上将军”一职作为府兵制度下的高级武官，身在皇都自然需要担负禁军的职责宿卫宫禁，同时还需要供君主仪饰之用^{[9]17-18}，以彰显君主威仪。《备急千金要方》中有“心应脉”“（水谷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肺居外而近上，合于皮毛，皮毛喜受邪，故肺独易为咳也”等记载，血脉为心所主，但脉中血液却需要由肺转输水谷精微方可化生，同时肺居于外上，合皮毛先受外邪，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外邪侵扰心脏。从功能上看，肺可辅佐君王助其威势，又可护君主周全，因此《备急千金要方》称肺为“上将军”。《华氏中藏经》也称肺为“上将军”，其称“肺者……号为上将军，乃五脏之华盖也”。上文提到，宋代的“上将军”一职承袭自唐代，但已成虚衔，并无职能，而《华氏中藏经》依旧称肺为

“上将军”，可能是因为承袭唐代旧制的“上将军”此时在名义上仍被认为有宿卫及仪饰之责，故当时的医家依旧根据这样的职能特征将肺与上将军相关联。《华氏中藏经》又称肺为“华盖”，即帝王车驾上的伞盖，既有仪饰之用，又可遮阳避雨，这与“上将军”彰显君主威仪、保护君主安全的职责类似。

（二）“将军”的地位与肺的位置

《张仲景五脏论》成书于战争频发的时期，军事力量至关重要，故“将军”拥有非常高的地位。肺在所有脏腑中居于最高，其位置与当时“将军”的极高地位是相对应的。《备急千金要方·肺脏脉论第一》云“（肺）为上将军使，在上行”，强调肺在上行使功能。唐代“上将军”作为中央高级武官，拥有较高的地位。另外，唐代“上将军”伴驾出行及守卫宫禁，往往需要伴随君主近旁，因此就空间距离而言，“上将军”与君主之间的距离较近，这与肺居于高位且紧邻心脏的特点相似。《华氏中藏经》称肺为“上将军”，依旧与其解剖位置相关。上文提到宋代的“上将军”作为虚衔被用于安置宗室及闲散武臣。这一官职可由宗室担任，地位自然不会低，暗合肺居于高位。另外，从血缘来看，宗室与君王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与心、肺紧邻的特点相符。

（三）肺脏不再称“相傅”的原因浅析

“相傅”是中国早期宰相的官职名称。就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变迁来看，南北朝时期宰相无定员、无定名、无定职，制度上无此官，习惯上又有此官^{[9]7}；而自隋代建立的三省六部制又将宰相之职权分归三省；唐代沿袭这一制度，分权于三省，但唐代君主常派其他官员参与其间，长此以往，三省被架空，参与的官员成为事实上的宰相^{[9]13}；宋代的“宰相”制度经历了5次变更，但均有两个官职共同承担“宰相”的职责^{[9]22}。可见，自南北朝至宋代的“宰相”多由数个官员共同担任，是集体而非个人，且由于在制度上并不称“宰相”（或称“丞相”“相傅”等），这些共同担任“宰相”的官员往往行“宰相”之职权而无“宰相”之名。因此，在本文研究的3部医籍成书之时，“相傅”在制度上已经消失，其实际职权又由数个官员共同承担，其称谓亦随朝代更迭而变化。肺之一脏难以同时对应多个时有称谓变更的官职，这可能是3部医籍不再称肺为“相傅之官”的原因。而主流的中医学理论之所以依旧称肺为“相傅”，可能更多的是医家对古籍的因循。

三、胆为“将军”的官职隐喻

《备急千金要方》与《华氏中藏经》均称胆为“将军”。

（一）“将军”的职能与胆的功能

1. 胆贮存胆汁，辅助肝脏

《备急千金要方·胆腑脉论》云：“胆者，中清之腑也。号将军，决曹吏。”上文提到，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肺与肝同称“上将军”，而作为与肝相表里的脏腑，胆又被赋予“将军”的官职，强调了肝胆在胆汁生成、贮存等方面的协同作用。“中清之腑”即言胆藏清净之胆汁。胆汁由“肝之余气”所生，王叔和《脉经》言“肝之余气溢入于胆，聚而成精”。需要说明的是，现存的《脉经》并无此语，为朝鲜医家许浚在《东医宝鉴》中提及并自注引自《脉经》^[18]。肝产生胆汁，胆贮存胆汁，肝胆以胆汁为纽带协同作用，似“上将军”与“将军”配合。

2. 胆主决断，协调脏腑

《华氏中藏经·论胆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载“胆者，中正之腑也，号曰将军，决断出焉”，

说明其称胆为“将军”多着眼于“决断”功能。另外,《备急千金要方》中胆“决曹吏”的别称应该也同“决断”有关。据《汉书》记载,“决曹吏”为司法吏员,参与案件的复审以及定罪量刑^{[19]2281-2284},其断案裁决的职能与胆“决断”的功能相通。就“决断”而言,两部医籍中均有胆“能喜能怒”,以及胆腑病变时患者“精神不守”的记载,可知胆对精神情志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精神情志的产生又以脏腑精气为物质基础,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情志过激会影响气血,伤及脏腑。此时胆主决断,不偏不倚的特性能够纠正偏倚过激的情志,使其重归中正平和,令脏腑、精气正常运行,恰如将军于沙场征战时指挥得当,令军队协同配合,攻守有度。

3. 胆司勇怯,行“将军”之职

胆司勇怯的功能与主决断的功能相辅相成,皆与精神情志相关。两部医籍在胆腑病变中均提及“心澹澹恐”,可见人之勇怯与胆相关。《灵枢·论勇》中即有“勇士者……其胆满以傍……怯士者……其胆不满而纵”的记载。胆气充足,人在面对较大精神刺激时多能镇静;胆气虚亏,则善惊易恐^[20]。“将军”作为武职官员,难免生杀之事,需要过人的勇气,这与胆司勇怯的功能密切相关。

(二)“将军”的地位与胆的位置

《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将军”是相对于“上将军”而言的,“上将军”的地位高于“将军”,胆称“将军”,肝加一“上”字彰显地位,不仅反映了肝胆的功能协同,也与胆居于肝下的解剖位置以及主次地位类似。《华氏中藏经》中亦言胆为“将军”,肺为“上将军”,但未称肝为“上将军”。此处可能不再映射肝胆的解剖位置,而是根据“脏尊腑卑”的关系说明胆作为六腑之一,其地位卑于五脏。宋代武人地位低下,“将军”地位自然不高;而“上将军”作为安置宗室和闲散武官的虚衔,虽无实权但地位较高,与“将军”不同。在重文轻武的时代背景下,“将军”不再由五脏担任,而被赋予胆腑,这与中医藏象理论中“脏尊腑卑”的观念相符。

(三)胆腑不再称“中正”的原因浅析

“中正”一职最早见于秦末,负责纠察群臣过失。《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王以朱房为中正……主司群臣”。三国时期魏国立“中正”以“藻别人物,知其乡中贤愚出处”;晋代及南北朝沿袭这一官职,至唐代“中正”一职才被废止^[21]。从存续期间的状况来看,“中正”主要负责监察官员与考察、选拔人才,但自隋代开始,科举制度逐渐代替了“中正”考察、选拔人才的职能,其监察之职也逐渐被御史台等监察机构代替。与“相傅”类似,“中正”在古代中国官制中并没有持续存在,自唐代废止“中正”后,这一官职在制度上消失,其职能也被分散给数个官员共同承担,其称谓亦随朝代不同而有所出入。因此,在脏腑官职隐喻系统中,胆与肺一样难以同时对多个时有称谓变更的官职,故《备急千金要方》等医籍不再称胆为“中正之官”。

四、多脏腑同为“将军”的官职隐喻

在本文列举的3部医籍中,《备急千金要方》与《华氏中藏经》均出现了多个脏腑同称“将军”的现象:前者称肺、肝同为“上将军”,胆为“将军”;后者称肺为“上将军”,胆为“将军”。这种现象或与上文提到的唐代武职人员职能的拓展以及宋代官制名实不符、重文轻武的时代背景有关。

(一)唐代“将军”职能的拓展

盛唐时期,武职人员在战争之外广泛参与社会事务,担负多方面的职能。因此,当时的医家在这种

背景下，将“将军”这一肩负多种职能的官职同时赋予数个脏腑，体现脏腑的不同功能。

肝与肺皆称“上将军”，源于两者对心脏的协助与保护。《备急千金要方》记载肺转输精微而生血，抗御外邪保护心脏；肝能藏血，以其藏血之功辅助心脏。且肺与肝是距离心脏最近的两个脏器，肺脏覆于心脏之上，肝脏托于心脏之下。两者的特点均与“上将军”相称。而《备急千金要方》又称肺为“大尚书”、肝为“郎官”，大尚书位尊而郎官相对位卑，暗合肺在心上、肝在心下的位置关系。《备急千金要方》称胆为“将军”，这与胆协同肝存泄胆汁的功能及附于肝下的位置相关。

（二）宋代“上将军”名实错位及“将军”地位低下

宋代官制多有名实不符，“上将军”一职名义上的宿卫、仪饰职能，与事实上的用于安置宗室而无真正职能的高位虚衔状态，共同构成了对肺抗邪助心、居于体腔高位等特征的隐喻映射，故《华氏中藏经》保留了肺为“上将军”的官职隐喻。而肝在低位，与宋代“上将军”的高位虚衔特征不符，因此不再称其为“上将军”。同时，在重文轻武的时代背景下，实际承担武官职能的“将军”多受贬抑，地位较低，有决断之功且为六腑之一、卑于五脏的胆自然更符合宋代“将军”的特征。另外，唐宋虽均称胆为“将军”，但背后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从脏腑对应的官职系统来看，唐代称肺与肝为“上将军”、胆为“将军”，宋代肺为“上将军”、胆为“将军”，肝的“上将军”的称谓被取消，说明脏腑所对应的官职系统发生了改变。宋代不再通过“上将军”与“将军”的协作及上下级关系，映射肝胆在生成及贮存胆汁功能上的协同与解剖位置上的临近，而主要强调“将军”本身的职能特点及地位，并以此映射胆的“决断”之功及其作为六腑之一卑于五脏的地位。

五、“肺、胆为将军”未被后世沿用及其原因

（一）“肺、胆为将军”未被后世沿用

从宋代以后的医籍来看，肺、胆为将军的脏腑官职隐喻未被后世沿用。金元时期的医籍如《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格致余论》均言肝为“将军之官”；明清时期的医籍如《类经图翼》《冯氏锦囊秘录》《脉诀汇辨》等亦言“肝者，将军之官”。已无肺、胆为“将军”之说。

（二）未被沿用之原因分析

“肺、胆为将军”官职隐喻未被后世沿用，一则由于宋代之后武人地位的回升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宋代以后至清末的历史时期，武人的地位较宋代有所回升，同时这一时期也再未出现如南北朝一般持续上百年且极为动荡的分裂割据，因此武人的地位虽有回升却难至高位；二则由于肺、胆为将军的脏腑官职隐喻在事实上从未成为普遍共识。中国素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文化传统，中医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多引述而少创新，因此与本文列举的3部医籍同时代成书的其他医籍多奉行《黄帝内经》的“十二官”理论，沿用“肝为将军”的脏腑官职隐喻，例如隋末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唐代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宋代官修方书《圣济总录》均以“十二官”为准绳。另外，3部医籍中的脏腑官职隐喻是基于其时代背景而提出的理论，当时代变迁、官制改动时，这些理论必然过时，不再适配新的时代与官制。因此，即便如《备急千金要方》这一颇具影响力的医籍，其中的脏腑官职隐喻也未能在后世得到沿用。若脏腑与官职的对应关系随着时代变迁实时变化，则各朝都会出现不同的脏腑官职隐喻，多变的对应关系显然不利于中医学的传承发展，这时“十二官”作为形成最早、最具权威性的脏腑官职隐喻，反而有助于医者形成统一的认知。由此可见，在中医学脏腑官职隐喻的发展过程中，《黄帝内经》

的“十二官”始终是主流,有别于“十二官”的理论创新也只在寥寥几部医籍中出现,并非普遍共识。综合以上因素可知,武人的地位回归到相对持中的水平,使肺与胆在解剖位置、脏腑功能上不再与“将军”相符,且肺、胆为“将军”的理论创新又从未成为普遍共识,故而这些隐喻随时代变迁不再被沿用。

《黄帝内经》确定了“将军”与肝的隐喻映射,成为中医学理论的主流观点。自南北朝至宋代,“将军”作为始源域所映射的脏腑由肝扩展到肺和胆,甚至同时映射多个脏腑。这些隐喻在宋代以后衰落,“肝为将军”的隐喻回归。以上的变迁与“将军”职能以及地位的变化是分不开的:社会政治变迁导致“将军”职能及地位变化,在功能、位置方面与“将军”职能、地位相应的脏腑也随之发生改变;“相傅”“中正”官职消失、职能分散,共同促进了不同历史时期“肺、肝、胆为将军”的多种隐喻映射形成。这也说明藏象理论中“某脏或某腑为将军”的脏腑官职隐喻映射始终随着“将军”这一始源域的变化而变化,可见隐喻在中医藏象理论的构建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语言是隐喻的语言,在中医学理论研究中,重视隐喻的作用,善用隐喻这一认知工具,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医学理论的构建,助力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2] 窦嘉乐,赖敏,郭璿,等.中医隐喻研究的目的和意义[J].世界中医药,2021,16(19):2905-2909.
- [3] 马子密,贾春华.取象比类:中国式隐喻认知模式[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2,14(5):2082-2086.
- [4] 万方,宋大仁,吕锡琛.古方“麻沸散”考:兼论《华佗神医秘传》的伪托问题[J].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5(4):27-34.
- [5] 黄兆强,刘家华,黄孝周.《华佗神方》与仲景方探析[J].国医论坛,1990(3):3-4.
- [6] 宫下三郎.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校译注[J].南都学坛(自然科学版),1992(2):105.
- [7] 金礼蒙.医方类聚(校点本):第一分册[M].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潮州中医院,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
- [8] 李金田.关于敦煌写本张仲景《五脏论》的作者与成书年代[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3(2):54-55.
- [9] 黄本骥.历代职官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10]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 [11]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六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12] 李聪甫.中藏经语译[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 [13] 赵晨,沈红.《中藏经》成书时代考述[J].语文学刊,2017,37(3):128-132.
- [14] 林毅.《中藏经》脏腑辨证部分考[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4):9-10.
- [15] 李晓艳.浅谈从《中藏经》的版本系统见其流传[J].黑龙江史志,2015(12):35.
- [16] 托克托.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7]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8] 朱宗元.“肝之余气溢入于胆、聚而成精”小议[J].中医杂志,1980(8):78-79.
- [19]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0] 麻晓慧.胆与神志考释[J].中医函授通讯,2000(1):14-15.
- [21] 宋秋梦.脏腑与官职映射的隐喻分析与中西医对应句子的 ERP 比较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21.

(本文编辑 朱传磊)